

我之所以在清官之中首先选择海瑞写传记，主要是因为他确实兼备了清官各方面的特点，既能通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可谓清明。不考虑任何外来因素，不考虑个人得失、生死，坚决按原则，按是非办事，可谓清正。无论在朝在野，无论品位高低，始终布袍脱粟，不图锦衣玉食，可谓清廉。不与官风不正、学风不正、为富不仁者交往，敬而远之，可谓清介。从各方面看，海瑞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清官。

蒋星煜 著

海瑞



蒋星煜 著

海瑞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瑞/蒋星煜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08-07517-7

I. 海... II. 蒋... III. 海瑞(1514~1587)—传记
IV. 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8144 号

封面绘图 程十发
封面题签 周慧珺
责任编辑 杨柏伟
封面设计 杨钟玮
美术编辑 杨德鸿

海 瑞

蒋星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3 字数 177,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978-7-208-07517-7/K·1399

定价 16.00 元

自序

翻开《二十四史》，我们会发现史学家们为历代的隐士和清官写了不少传记，引起了我的注意。对照西方的历史，虽然也有类似隐士的称谓和记载，但是，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影响远不如中国的隐士那么显著，而且人数迄未形成或大或小的群体。我在青年时代曾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作了初步的探讨。

至于清官，和老百姓的关系较隐士密切得多，因为不像隐士那样处于在野的地位，而是在朝，要和最高统治者皇帝以及公卿百官乃至将军等权势人物打交道，有时还发生了震惊朝野的重大事件。有关清官的类似称谓和记载，在西方史书中也较中国史书少得多。有感于此，我萌生了为清官写作传记的想法。

为清官下一科学的定义，并不容易，因为包含的内容相当复杂也。《辞海》第1143页〔清官〕释文如下：

称公正廉洁的官吏，与“贪官”相对。元好问《薛明府去思口号》：“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不能说错，但是也许限于字数，说得太简单了。清官绝对不仅仅与“贪官”相对，举例来说，《十五贯》中的过于执，并未贪污。他根据苏戍娟的容貌

“艳若桃李”，便断定她不可能“冷若冰霜”，便由此确认她和熊友兰私通，而且这一男一女便是杀害尤葫芦的凶手也。当然，过于执是朱素臣创造的艺术形象，不是真人真事，但过于执这样凭主观臆测进行断案的官员不乏其人。

我以为清官基本上要具备以下的条件，首先是精细的观察能力和果断的分析能力，也就是能把握事件的本质及其关键所在。被颂扬为“明察秋毫”、“秦镜高悬”的官员属于这一类。

封建社会的官员大都出身于科举，经过乡试、会试两级考试并取得名次的文人，应该说文化水平、理解水平都是优选出来的人才。担任多年文牍的书吏而提升为官员则经验丰富。这两类官员之所以会出问题，往往是受到上级的压力，要抵制这种压力非要有冒丢官甚至被杀害等风险的勇气不可。汉代的董宣是典型的例子，所以有强项令之称。

另一种情况是受贿，行贿者往往用金钱、美女、华屋、名画等礼物，投其所好。原则性不强的官员经不住诱惑，收受了下来。即使他完全明白事件的真相，仍旧不愿弄清楚是非曲直，而只可能听从行贿者的要求办理，于是造成冤案冤狱。贪官也担心被揭发或败露，所以行贿者行踪非常诡秘。汉代杨震一生清白，行贿者劝他接受贿赂，谓无人知晓，收之无妨。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坚决拒绝。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廉洁奉公的官吏，俸禄之外不取民间一针一线，有时还用俸禄周济贫困百姓，自身的生活则异常艰苦。三国时吴国郁林太守陆绩回江南故乡时，行李只有寒酸的铺盖数件，船只因载重太轻，无法航行，最后搬了岸上巨石压舱，方能启程，这也是一种典型。

当然，也有一批官员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做了许许多多兴修

水利、移风易俗等好事，但却不一定有传奇性的故事。

我之所以在清官之中首先选择海瑞写传记，主要是因为他的确兼备了清官各方面的特点，既能通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可谓清明。不考虑任何外来因素，不考虑个人得失、生死，坚决按原则、按是非办事，可谓清正。无论在朝在野，无论品位高低，始终布袍脱粟，不图锦衣玉食，可谓清廉。不与官风不正、学风不正、为富不仁者交往，敬而远之，可谓清介。从各方面看，海瑞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清官。

海瑞一生，从任南平县学教谕起，开始进入官场，便因不肯轻易下跪迎接知府、巡按御史，得罪了上级。任淳安知县时，法办寻衅滋事的副都御史鄢懋卿的公子，鄢懋卿借巡视为名到各地搜括民脂民膏，海瑞婉言拒绝入境。因为鄢是奸相严嵩的死党，海瑞这样做，许多富有正义感的官员、文人都异常钦佩，但也为他的命运捏了一把汗。任兴国县知县时，前任兵部尚书张璠的侄子张豹、张魁到兴国收购木材时，无恶不作，张璠和各级官员相互勾结，予以包庇。海瑞决定予以严惩，事情闹到江西总督吴百朋处，最后张豹、张魁仍被海瑞法办了。海瑞进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时，嘉靖皇帝已多年不上朝，一心求仙，严嵩虽然垮台，政局却未扭转日趋恶化的形势。内阁首辅次辅与各部尚书、侍郎等高官为保住乌纱帽，装聋作哑，海瑞以区区六品官却上了“直声震天下”的《治安疏》，沉痛劝谏嘉靖，被关进了诏狱，随时都可能被处死。嘉靖病故，海瑞出狱后累升至应天十府巡抚。告老还乡的元老重臣徐阶是松江府华亭县人，正在应天十府管辖之内。徐府横行乡里、侵占民田的罪行累累，到巡抚衙门告状者比比皆是，海瑞并未因当年下诏狱时徐阶有救命之恩而徇私，勒令徐府退还了一批良田。徐府乃联络在朝在野的众官员与大地主合力打击海瑞，海瑞被迫罢官而回故乡琼山。乡

居十多年后曾再度出山，到南京任南吏部侍郎等职。南京的众京员，尤其御史等言官颇多败类，往往敲诈勒索，置公务于不顾，提学御史房寰劣迹尤多，他先发制人，诬陷海瑞，引起了众多具有正义感的官员和文人的公愤。但朝廷迟迟不作公断，直到海瑞将逝世时，房寰才被免职。海瑞一生充满了惊涛骇浪，他的经历比任何清官都要复杂，很值得写一写。

我觉得海瑞的斗争比包拯、况钟要艰苦得多。

包拯任开封府尹、三司使等官职时，北宋是最稳定的时期，宋仁宗赵祯头脑相当清醒，能掌握大局的动向，朝中也不存在明显的政治党派或集团。凡是包拯作出的决定，宋仁宗大都支持，即使有人进行挑拨，话也不大容易被宋仁宗采纳。再说，当时开封府尹的职务，非同一般，赵匡胤称帝后，即派其弟赵匡义为开封府尹。后来赵匡义继承了皇位。所以包拯在开封府尹任上的确威信极高，令行禁止，根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况钟在明洪熙、宣德年间由一名书吏一再提升为主事、郎中等官员，后来宣德皇帝直接派遣多名知府到几处特别富庶的或军事要冲的府治担任知府，况钟被派到苏州。民间称之为钦差知府，办事顺利之至。再说朝中内阁辅臣基本上是杨士奇等一批江西人，江南巡抚周忱也是江西人，况钟也是江西人，一直互通声气。所以况钟从未和上级发生任何矛盾，他查办了几个不称职的官员，也基本是知县以下的品位极低的官，所以并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再说况钟当时一心做他的苏州知府，也没有对朝中军政大计发表任何批评、建议。他的两任苏州知府就是在十分平静的气氛中度过的。

海瑞远没有包拯、况钟那么幸运，任南平教谕、淳安知县时是奸臣严嵩当权。到京任户部主事时，遇上了年迈的嘉靖，可说是典型的昏君。后来皇帝几次更迭，先是徐阶、高拱争权夺利，徐阶与张居正相互勾结，挤走了

高拱，张居正刚愎自用，容忍不了海瑞，把海瑞迫得只好辞职回海南故乡。七十多岁时又出山一次，申时行主持内阁，无张居正当年的才能和魄力，却懦弱而嫉忌贤能，海瑞一筹莫展，与房寰等贪官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直到临终前不久，房寰才被法办。他每任官职的时间都不长，但却做了大量工作，即如在应天巡抚任上先后不到一年，兴修水利，清理田赋、狱讼等等，都做出了显著的功绩。反对他的人也无法否认。所以我虽然行政工作极忙，还是挤出时间来写了一本篇幅较小的海瑞传记。

二

我之所以写《海瑞》传记，还有客观上的原因，那就是《十五贯》在全国风行之后，上海市文化局领导李太成同志叮嘱我注意一下历史上的清官题材，是否有适合于京剧或其他剧种演出的，希望我推荐。我浏览了许多清官的史料之后，向他提供了有关海瑞的题材。并且说明《十五贯》况钟的《见都》一场，与巡抚周岑发生争执一事，戏剧性极强，但出之于艺术虚构。海瑞这位清官的历史经历确实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生活本身充满了戏剧性，据实编写就很感动人。李太成认为我挖掘清官戏的历史题材的工作还是有一定成果的。

历史人物传记《海瑞》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我在浙江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译的《刘伯温寓言》，也有几篇讽喻的气息颇浓。正好那是掀起反右运动的1957年，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写剧评的同志认为我提倡海瑞是和“右派”相呼应，必欲置我于“右派”方甘心。李太成同志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把我作为运动的对象。

1959年，全国忽然刮起一股海瑞风，据说党中央要提倡海瑞的刚正不阿的精神，而且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上海来做提倡海瑞精神的大报告，要学术界、文学艺术界密切配合。据罗竹风同志告诉我，当时机关各级干部纷纷找寻参考材料，惟一的一本就是我的《海瑞》，只有77000字篇幅，比较简单，感到不满足。但除此之外，只有明清两代原刻的海瑞文集了，阅读非常吃力。至于吴晗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人物小丛书》本《海瑞》，却仅仅15000字，简单到极点，而且出版较晚，所以影响不大。

正因为我是惟一一本《海瑞》传记的作者，所以周扬到上海作了学习海瑞精神的大报告之后，我立刻成了《解放日报》、《文汇报》、《劳动报》、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组稿对象，忙得不亦乐乎。在周扬做大报告的同一天，《解放日报》记者张世楷来电话，要求我为《朝花》写一篇海瑞的故事。通讯员取走之后，又来电话谓题材与主题均可，但太短，要予以丰富发展。晚饭后，他在报社等我，面谈加工的问题。晚上六时半，我到报社，文艺部主任黎家健接待我时，说明并无其他要求，希望写得细一点、生动一点，篇幅可以提供《朝花》整个版面，大约6000字左右。我正准备回家仔细思考时，黎家健说：“这篇文章明晨一定要见报，你就在编辑部里写，写完时叫我好了。”我知道党报安排的紧急任务，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喝了几口茶，开始写了。好在史料都熟悉，用不着去翻参考书。写到十一点多钟，就写完了。字数只有5000左右，也没有精神再增补了。交到黎家健手里，他看了一遍，点头认可。便放我回家了。

第二天，亦即4月17日，《解放日报》出版，《朝花》真的发了这篇文章，夜里我匆忙之中，未写题目，报社代我拟了《南包公海瑞》的标题。这天上

午上海市文化局开会，由刘厚生传达周扬对上海文化学术界的报告。传达结束时，他又加了几句话：“蒋星煜同志今天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南包公海瑞》，也是写的海瑞著名事迹之一。”

《文汇报》当时负责人为陈虞孙，原是我的老上级。他布置副刊《笔垒》主编徐开垒通知我，把海瑞一生事迹，写成18个段落。他们已和程十发联系好，由他根据文字配画，用连环画形式发表，我也照办了。

在当时，读者当然是很欢迎这些作品的，《海瑞》这本传记得到再版的机会，时间催得急，内容来不及再补充，只增加了2000字篇幅。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张春桥直接操纵之下，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此文首先歪曲了明史，歪曲了历史人物海瑞的本来面目，然后把学术问题、文学艺术问题无限上纲，而且语气专横武断，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学术界、文学艺术界人士无不感到愤慨和震惊。

就在此时此刻，张春桥定下“引蛇出洞”的奸计，逼迫《文汇报》召开讨论姚文元文章的座谈会，名单由张春桥决定。开会通知则寄送参加者单位党委、党组，要求党委、党组保证被邀请者准时参加。有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杨宽、刘大杰、谭其骧等十五位，我因为写了《海瑞》传记，1959年又为《解放日报》、《文汇报》写了评介海瑞的文章，所以也在这十五位被邀者之中。这次座谈会，大家的发言都表示了对姚文元文章的不满，认为不利于学术界的争鸣。对于吴晗，认为他对海瑞的研究不够全面，《海瑞罢官》的剧本也欠完美，但吴晗热爱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反党分子。

吴晗为《海瑞罢官》作了自我批判以后，《文汇报》再次召开座谈会，出

席人员与第一次座谈会完全相同。因为第一次座谈会说明记录不公开发表,供内部参考而已。所以第二次座谈会发言比较踊跃。结束时,却宣布发言记录要在《文汇报》上发表。此事完全出于大家意料之外,开始感到其严重性非同一般。我的发言主要谈一个问题:对待历史人物,一般都主张一分为二地评价。这一原则对海瑞也应该适用,如果适用,又应该如何分法。

1966年2月26日,徐景贤领导的写作班子用丁学雷的署名,在《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为谁服务》一文说“蒋星煜同志不但为这个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亲自参与设计”。还说我和吴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随后即进行无限上纲的诬陷。

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我个人以及家庭陷入苦难的深渊。

“四人帮”被粉碎后,有关海瑞的一切冤案都得到了平反。上海人民出版社将《海瑞》再版,我自问对海瑞的史料采择比较审慎、评价亦相当客观,因此对其生平经历以及刚正不阿的嫉恶如仇的头争事迹均未作任何修改,在篇幅上略有补充。

1982年4月,我有机会访问了海瑞的故乡海南岛琼山县,并拜谒了正在重建的海瑞墓。我所保存的有关海瑞的若干文物,被红卫兵用封条封在书橱中十年之久,我决定捐献给当地文管单位,其作用比放在我身边要大得多。

当时海南尚未建省,称海南行政区,由中共广东省委一位副书记领导。副书记名罗天,曾亲自到招待所来看我,态度和蔼可亲。他对我捐献文物表示了由衷的谢意。中共海口市委书记周训堂同志,和我接触了多次,他

对历史学,对文艺都是行家,所以我们共同的语言很多。原来他在县里工作时,具体组织、领导了琼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和演出。后来电影的《红色娘子军》成了经典,导演谢晋、主演祝希娟当然贡献很大,但最早发掘这一题材并搬上舞台的周训堂也有一份功劳,知道的人就极少了。



1982年4月蒋星煜在海南岛海口市委礼堂作专题报告

周训堂同志很严肃地和我谈了一个问题:经过十年动乱,有关海瑞的文物均被破坏无遗,海瑞墓被挖开,造反派没有找到什么殉葬的金银财宝,恰恰又一次证明了海瑞确是清官,但他们却更为怨恨,所以作了毁灭性的破坏。另一方面,即使在“文革”期间,海外侨胞回海南探亲时,仍念念不忘这位正气凛然的乡贤,还是在墓园前面较远的地方焚香膜拜,使他深为感动。现在修整墓园的工程正在进行,但“四人帮”的余孽心有未甘,暗地里仍在散布姚文元、戚本禹、徐景贤等人污蔑海瑞的谬论,造成了一部分人的思想上的混乱。听了这番话,我当然也觉得要认真对待。



1982年4月在海南岛海口市市委礼堂中的听讲者，右第一人为市委周书记

周训堂同志要求我就海瑞的生平经历及其所作出的贡献作一次专题报告，说得异常恳切，我觉得义不容辞，就接受了邀请。报告是在中共海口市委大礼堂举行的，海南行政区、海口市两级的宣传部门、文教部门、外事部门、旅游部门的同志都来听了报告。根据周训堂同志的提示，我特别在将结束时提了一提海瑞的婚姻问题：海瑞是一个历史人物，不可能是完人，他有他的局限性，尤其在婚姻问题上显然是大男子主义者，对女权很不尊重。他曾不止一次娶妾，也是事实。当时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婚姻法，在封建社会，娶妾并不违法，高级官员娶妾那就更普遍了。再说，我们研究海瑞、提倡海瑞精神都是肯定海瑞的不畏强梁、廉洁奉公并尽力为老百姓办实事，从未有任何人歌颂他的娶妾也。

报告会开完，周训堂同志认为讲得很好，许多问题也省得他一遍一遍地解释了。

三

《海瑞》一书,以前三次出版,都没有序。现在是第四次出版,觉得还是把写作动机、写作经过说一说好,所以写了这篇序。正因为《海瑞》这本传记牵涉到的方方面面不少,所以序的内容也比较庞杂,有的地方也许已经扯得远了一点,相信还是提供了知识或信息的。

蒋星煜

2007年10月

目次

自序	1
第一章 危机四伏的 16 世纪后叶的明朝	
一 明军的腐朽	1
二 封建统治阶级的昏聩、贪鄙和残酷	2
三 宗派集团的树立和彼此之间的斗争	5
第二章 从一介书生到福建南平县儒学教谕	
一 清寒的身世和幼年的学养	7
二 以治黎策中了乡举	15
三 抗颜不屈的南平县儒学教谕	18
第三章 出任淳安知县和兴国知县,初展抱负	
一 改革赋税役税以减轻人民负担	25
二 推行保甲法,组织地方自卫武装	27
三 屡次明断疑案,深得民心	29
四 以从政经验编写淳安政事	31
五 为权贵所不容,被排挤离任	35
六 任兴国知县,百废俱兴	39
第四章 衷心匡扶明室,慷慨进谏	
一 切中时弊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42

二	被捕下狱得到徐阶的救援	46
三	卷进宗派集团的纷争	55
第五章 任应天巡抚时的辉煌政绩		
一	以工代赈疏浚吴淞江和白茆	60
二	清理狱讼、均田均税和遣散募兵	67
三	克服各种障碍推行一条鞭法	76
四	被政敌们群起攻击,解职回乡	83
第六章 闲居了十六年以后再度出山		
一	寂寞的晚年家庭生活	98
二	写作应酬文章和编刻自己的文集	99
三	关心国事,不甘老于林壑	109
四	抚按科道交章推荐	112
五	七十二岁的老翁再上政治舞台	114
六	房寰事件引起轩然大波	118
第七章 享年、子嗣、墓葬的情况		
一	海瑞究竟活了多少岁	128
二	海瑞所以无子嗣的原因	131
三	滨涯村海瑞墓并非衣冠冢	134
第八章 思想渊源与历史影响		
一	王阳明、李贽对海瑞的影响	139
二	房寰事件成了东林党的嚆矢	144
三	李贽、陈继儒、汤显祖等对海瑞的评价	157
四	海瑞受人民群众拥护的原因	160

五 海瑞的佚诗、佚联与墨迹	166
六 以海瑞为题材的民间传统文艺	172
附录之一	
瓦格纳所长的疑问——关于海瑞戏	183
《海瑞罢官》冤案的史实谬误	186
听一个被告的“最后陈述”	192
附录之二	
治安疏	195
被论自陈不职疏	205
附录之三	
《文汇报》1978年12月29日报道两篇	213
《人民日报》1979年6月19日载新华社上海电讯	216
附录之四	
蒋星煜文、程十发绘连环画《海瑞》	218
后记	229
2007年新版后记	235